

古印度文化圈与新汉文化圈*

张 远

摘 要：古印度文化圈与古汉文化圈既各具特色，又遥相呼应。印度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是世界古代文明的十字路口，也是各民族、语言、文化交汇碰撞之地。古印度以印度为“中”，以中国等国为“边”“夷”“蔑戾车”之地。中国的求法僧甚至常以生于“边地”而“自伤”，发愿“不生边地”，足以见出其时古印度文化圈的巨大魅力。古汉文化圈以汉字为核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之一，也是世界古代文明的重要枢纽，与古印度文化圈具有很大程度的交叉融合。当欧洲工业革命带来的近代文明迅速追赶上东方文明，古印度文化圈与古汉文化圈相继解体。在新汉文化圈和谐重建的过程中，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印度的作用也不容小觑。第一，新汉文化圈的重建需要印度。古印度文化圈一度以佛教征服世界，也曾对古代中国影响深远。古印度文化圈为新汉文化圈的重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营养。正是与“二西”（释迦之“西”和耶稣之“西”）相遇，成就了今日之中国。第二，新汉文化圈的重建有益于印度。一如残缺不全的梵文三藏，在汉文三藏中重生；云遮雾绕的印度历史，在汉文史料中重生；艰涩生疏的梵文语汇，在现代汉语中重生。从某种程度上讲，重新崛起的汉文化圈容纳了古代的印度，让已不复存在的古印度文化圈在新汉文化圈中获得了部分重生，亦必将对当今印度的发展带来启示。

关键词：古印度文化圈 古汉文化圈 新汉文化圈

* 本文是作者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梵语戏剧家跋娑作品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8CWW008。

汪德迈先生是一位非常重要也特别接地气的法国汉学家。在《汪德迈全集》最新出版的《新汉文化圈》^①中，他特别谈到了日本在新汉文化圈重建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这让我们不禁联想到了古代的印度。

印度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文明的先驱，世界古代文明的十字路口，也是各民族、语言、文化交汇碰撞之地。印度学研究，特别是印度古代史、文化史、文明史的研究，与世界各国文明史的研究密切相关。印度人创造了婆罗门教和佛教。宗教的力量将印度思想传播至亚洲各国。法显、玄奘、义净等中国求法僧成为中印交流史上的中坚力量。六派哲学连同佛教哲学则影响着整个世界。因为人种同祖，语言同源，印度的语言与西方各大洲的语言一脉相承。梵语研究开启了比较语言学的新纪元。吠陀研究产生了比较神话学。史诗《摩诃婆罗多》堪称世界之最。印度诗人的丰富想象令人叹为观止。《本生经》《五卷书》等寓言故事通过《伊索寓言》《一千零一夜》广泛流传，再经由拉·封丹之手成为欧洲寓言故事的原型。甚至在数学、天文学、医学、政治学乃至雕塑、建筑等领域，印度与欧洲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体到我们的汉文化圈而言，古印度文化圈为古汉文化圈和新汉文化圈提供了营养，古汉文化圈与古印度文化圈具有很大程度的交叉融合，而新汉文化圈的构建又势必会对古印度文化圈的重构和当今印度的发展带来裨益。

一、古印度文化圈——古印度的“中国”

早在公元之初，贵霜帝国沟通中原王朝、南亚次大陆、地中海和欧亚草原，是丝绸之路上最大的枢纽。贵霜帝国的统治中心逐渐迁至印度，在犍陀罗地区达到鼎盛。迦腻色迦王时期（公元2世纪），犍陀罗有一座名为“四方僧伽”（Saṃgha Caturdiśi）的寺庙，很可能原

^① 参见〔日〕常磐大定著《印度文明史》，陈景升译，北京：华文出版社，2019年，第1—4页。

指其中的僧人来自四方。^①在泰尔梅兹（Termez，今乌兹别克斯坦最南端边境）附近还有两座大众部（Mahāsaṃghika）的佛教寺院。考古发掘的铭文（以陶罐为主）揭示了当地的僧人使用不同的语言，有佉卢文写成的犍陀罗语（Gandhāri in Kharoṣṭi Script），婆罗谜字体写成的初级梵语（Corse Sanskrit in Brahmi），希腊字母写成的巴克特里亚语（Bactrian in Greek Letters），希腊语（Greek），以及未知语言文字（Undeciphered Script and Languages）。^②可以说，世界各地的僧人带着他们各自的语言和文化在古印度及其周边地区汇聚。

大约在公元5世纪，中国的求法僧法显访印之时，印度结束了贵霜王朝的统治，处于笈多王朝时期。《高僧法显传》（以下简称《法显传》）中有这样两段叙述，令我印象非常深刻。

法显、道整初到祇洹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伤生在边地（一作“夷地”），共诸同志游历诸国，而或有还者，或有无常者，今日乃见佛空处，怆然心悲。彼众僧出，问法显（一作“显、道”）等言：“汝（一作“汝等”）从何国来？”答云：“从汉地来。”彼众僧叹曰：“奇哉！边地（一作“边国”）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谓言：“我等诸师和上相承以来，未见汉道人来到此也。”^③

- ① Sten Konow, ed. *Kharoṣṭhi Inscriptions* (Varanasi: Indological Book House, 1969), pp. 120–121. 美国新泽西学院历史系刘欣如教授2022年11月18日在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学术报告《贵霜帝国的语言和艺术》中将“Saṃgha Caturdiśi”译作“四方寺”。北京大学王邦维教授指出，“Saṃgha Caturdiśi”本意作“四方僧伽”（《佛教汉梵大辞典》作“cāturdiśa-saṃgha”，第279页），为佛教戒律中的特定概念，与“现前僧伽”相对，此处或不仅指寺名。参见王邦维校注，〔唐〕义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校注》第三十六章《亡则僧现》，“四方僧”，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15—219页。
- ② V. Vertogradova, “Indian Inscriptions and Inscriptions in Unknown Lettering from Kara-tepe in Old Termez”, Japan: USSR Academy of Sciences,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Nauka Publishers, Central Department of Oriental Literature, 1983. 引自刘欣如教授2022年11月18日在中国历史研究院的学术报告《贵霜帝国的语言和艺术》。
- ③ 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62页。参见《高僧法显传》（T2085），〔日〕高楠顺次郎等编：《大正新修大藏经》（以下简称《大正藏》）第51卷，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年，第860页第3栏第1—8行。

乃至中天竺……法显住此三年，学梵书、梵语，写律。道整既到中国，见沙门法则，众僧威仪，触事可观，乃追叹秦土地，众僧戒律残缺。誓言：“自今已去至得佛，愿不生边地。”故遂停不归。法显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汉地，于是独还。^①

第一段讲的是，法显和道整“自伤生在边地”，而印度僧众见到边地（汉地）之人来此求法，也都非常惊讶，赞叹称奇。第二段讲的是，道整来到了印度的“中国”（今印度中央邦一代），见到这里“众僧威仪”，发誓“愿不生边地”，“遂停不归”了，只有法显为了将戒律带回汉地，“于是独还”。

类似的记载还有很多。如《法显传》中：

有国，名毗荼。佛法兴盛，兼大小乘学。见秦道人往，乃大怜愍，作是言：“如何边地人，能知出家为道，远求佛法？”悉供给所须，待（一作“侍”）之如法。^②

又如《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那烂陀寺僧众苦留玄奘，而玄奘坚辞，愿回国译出《瑜伽师地论》等以报戒贤师恩：

法师即作还意，庄严经像。诸德闻之，咸来劝住，曰：“印度者，佛生之处。大圣虽迁，遗踪具在，巡游礼赞，足预平生，何为至斯而更舍也？又支那国者，蔑戾车地（梵文 mleccha，意为野蛮人，低种姓人，不说梵语，不拜天神），轻人贱法，诸佛所以不生，志狭垢深，圣贤由兹弗往，气寒土险，亦焉足念哉！……

① 章巽校注：《法显传校注》，第120页。参见《高僧法显传》（T2085），《大正藏》第51卷，第864页第2栏第18行至第3栏第4行。

② 同上书，第44页。参见《高僧法显传》（T2085），《大正藏》第51卷，第859页第1栏第19—22行。

经言‘诸天随其福德，共食有异。’今与法师同居赡部，而佛生于此，不往于彼，以是将为边地恶（一作‘边恶地’）也。地既无福，所以不劝仁归（一作‘劝仁勿归’）。”法师报曰：“无垢称言：‘夫日何故行赡部洲？’答曰：‘为之除冥。’今所思归，意遵此耳。”^①

这种情况王邦维先生在他的专论《“洛州无影”与“天下之中”》中有非常精彩的论述。古代印度大致分为五个部分，称为“五印度”或“五天竺”。其中中央的部分，即中天竺，称作“madhyadeśa”，译成汉文，也是“中国”。这是印度之“中国”，而非中国之“中国”。^②《释迦方志》辨析了印度之“中国”之为“中”的原因：“佛之威神，不生边地，地为倾斜故。中天竺国如来成道树下有金刚座，用承佛焉。据此为论，约余天下以定其中。”而后说到“中天竺”之名。“所言名者，咸谓西域以为中国，又亦名为中天竺国。此土名贤谈邦之次，复指西宇而为中国。若非中者，凡圣两说不应名中。昔宋朝东海何承天者，博物著名，群英之最，问沙门慧严（一作‘惠严’）曰：‘佛国用何历术而号中乎？’严云：‘天竺之国，夏至之日，方中无影，所谓天地之中平（《高僧传》卷七作‘所谓天中’）也。此国中原，影圭测之，故有余分，致历有三代、大小二余增损，积算时辄差候，明非中也。’承天无以抗言。”^③《弘明集》卷七有云：“佛据天地之中而清导十方，故知天竺之土是中国也。”^④

古印度以印度为“中”，以中国等国为“边”“夷”“蔑戾车”之

① 孙毓棠、谢方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102—103页。参见《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T2053）卷五，《大正藏》第50卷，第246页第1栏第11行至第2栏第3行。

② 王邦维：《“洛州无影”与“天下之中”》，《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99页。

③ 范祥雍点校：《释迦方志》，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7—8页。参见《释迦方志》（T2088）卷上《中边篇》第三，《大正藏》第51卷，第949页第1栏第8—20行。

④ 《弘明集》（T2102）卷七，《大正藏》第52卷，第47页第2栏第26—27行。

地。中国的求法僧甚至常以生于“边地”而“自伤”，发愿“不生边地”，足以见出其时古印度文化圈的巨大魅力。

二、古汉文化圈——博采“二西”，融贯东西

古汉文化圈以汉字为核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之一。古汉文化圈与古印度文化圈既各具特色，又遥相呼应。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丝绸之路雏形。^①西汉王朝开辟的丝绸之路更是延续千年，成为古汉文化圈的内核与延伸区域，成为连接东方与西方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古汉文化圈包含着古印度文化圈的诸多元素，而古印度文化圈内也依稀可见古汉文化圈的身影。二者具有很大程度的交叉融合。

古汉文化圈与古印度文化圈交叉融合的一个典型例证是《秦王破阵乐》的西传与东播。

大唐初年是丝绸之路历史上的标志性阶段，也是中印交流史上的黄金时段。从公元641年至648年，印度戒日王与中国唐太宗六度互遣使臣，中国和印度之间的关系由疏远到亲近。而与潮起潮落的官方往来相对的，是民间涓涓细流般从未间断的交往。西行路上，无论疾风还是骤雨，无论烈日还是冰雪，无数的僧侣和商旅在这条绵延古道上无声地书写着它的繁荣与辉煌，包括音乐、雕塑、服饰、绘画在内的文化艺术等人类文明的精华也得以突破地域的限制，走向世界。^②

大名鼎鼎的《秦王破阵乐》初现于武德年间（618—626），又名《破阵乐》《破阵舞》《破阵乐舞》，简称《破阵》；公元633年后更名《七德》，又称《七德舞》，与《破阵》等名并存。《秦王破阵乐》并非唐太宗首创，而是源自中国民间散曲和传自外族，后经汉地乐师吕才协调音

① 赵逵夫：《“一带一路”的战略构想与丝绸之路的文化传统》，《甘肃社会科学》2015年第6期，第105—106页。

② 张远：《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中印交流——以唐初六次遣使时间及唐使官阶为重心的回顾》，《甘肃社会科学》2016年第5期，第143页。

律，又混入西域（龟兹）元素，包含了各族音乐风格，兼具宫廷精英的音乐才华和民间艺术的旺盛生命。《秦王破阵乐》被商旅或僧侣带入印度，在戒日王会见玄奘之时已广为流传（有《大唐西域记》等史籍为证）；途经西藏（有《唐书》为证）；又随日本遣唐使传至日本（有古乐谱和古乐图为证）。^①由此可见，《秦王破阵乐》翻山越岭又远涉重洋，深受世界各地、各族人民喜爱。这也是古汉文化圈与古丝绸之路富于无穷学术魅力、具有无限拓展空间而被中外学者持续关注的重要原因。

古汉文化圈与古印度文化圈交叉融合的又一例证是产生于中印度的优填王造像，在于兴起，在中原鼎盛，又经由汉地东传日本。

优填王（公元前6世纪）梵名作Udayana，巴利名作Udena，源自ud-√i词根，意为“升起、日出”等，相传因他降生在日出之山而得名，汉译名有优填、优陀延、邬陀衍那、出爱、出光、日子等。优填王其人与佛陀释迦牟尼同时，是北印度十六古国之一犍子国（Vatsa，又译“跋蹉国”等，国都憍赏弥城）的国王，故而又称“犍子王”（Vatsarāja）。印度古典梵语文学作品中的优填王经历曲折离奇、跌宕起伏，是一位智勇双全、风流倜傥的“情圣”。^②佛教文献中的优填王则具有诸多面相，行走于丑化与美化之间。其中关于优填王造像的传说生动有趣，虽很可能并非佛教历史上的真实事件，却在佛教造像史、社会史乃至中印交流史上地位突出。

公元5、6世纪，中印度出现笈多样式的倚坐佛像，经海路传入南

① 张远：《〈秦王破阵乐〉是否传入印度及其他——兼与宁梵夫教授商榷》，陈明、周广荣主编：《风咏集——王邦维教授古稀寿庆文集》，上海：中西书局，2021年，第261—280页。原刊于《南亚研究》2013年第2期。在撰写时得到北京大学王邦维教授的帮助和指导。

② 现存六部梵语戏剧讲述优填王传说，分别是：跋娑（Bhāsa）的《负羁氏的誓言》（*Pratijñāyauḡandharāyana*，约2、3世纪）和《惊梦记》（*Svapnavāsavadatta*，约2、3世纪），佚名的《七弦琴仙赐》（残卷）（*Vīṇāvāsavadatta*，年代不详，跋娑之后），戒日王（Harṣavardhana）的《妙容传》（*Priyadarśikā*，7世纪）和《璎珞传》（*Ratnāvalī*，7世纪），以及摩特罗罗阇（Mātrarāja）的《苦行犍子王》（*Tāpasavatsarāja*，8世纪）。《负羁氏的誓言》和《七弦琴仙赐》讲述优填王与仙赐公主姻缘，《惊梦记》和《苦行犍子王》讲述优填王与莲花公主姻缘，《妙容传》讲述优填王与妙容公主姻缘，《璎珞传》讲述优填王与璎珞公主姻缘。

朝，以荆州大明寺的优填王像为代表。7世纪时，玄奘在印度巡礼、摹刻“出爱王思慕像”，并将其副本带回大唐。初唐以后，荆州大明寺优填王像逐渐衰落，扬州开元寺瑞像受到于阗瑞像的影响，借助新的神异来源，日益兴盛。^①日僧圆仁（793—864）入唐求法巡礼，在开成三年（838）暂住扬州开元寺时，通过“笔言通情”得知：“相公始自月三日，于当寺瑞像阁上刻造三尺白檀尺〔释〕迦佛像。其‘瑞像飞阁’者，于隋炀帝代，旃檀释迦像四躯，从西天飞来阁上。仍炀帝自书‘瑞像飞阁’四字，以悬楼前。”^②后代的记事遂将此寺“瑞像”作为“优填王瑞像”流传过程中的重要一环。983年，日僧裔然（938—1016）入宋，也曾到扬州开元寺参访。瑞像飞阁尚在，而像已被移至开封。当裔然一行抵达开封，终于有机会进入太宗的大内滋福殿，礼拜此栴檀瑞像。待他们参访五台山后返回开封，此像又被移至西化门外新造的启圣禅院。在申请获准后，裔然雇请中国工匠参照瑞像尊容，摹刻一尊，于987年运回日本，此即今日京都清凉寺的释迦旃檀像。^③

饱含异族风情的《秦王破阵乐》经汉地乐师协调音律而博采众长，西传印度，东播日本。诞生自中印度的优填王造像，在于闽兴起，在中原鼎盛，又经由汉地东渡日本。古汉文化圈因得到异质文化的滋养而生机盎然，亦作为文化的集散地向周边地区源源不断输送着思想与文化的结晶。

三、新汉文化圈——中印再续前缘

公元1世纪以来，中华文明冲破了地域的限制，向其他地区延伸，

-
- ① 刘屹：《坐立之间：优填王像的写真性与瑞像化》，郝春文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十一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22年，第34—35页。
- ② 〔日〕释圆仁著，〔日〕小野胜年校注：《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63页。
- ③ 刘屹：《坐立之间：优填王像的写真性与瑞像化》，郝春文主编：《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二十一卷，第30—32页及第33页图5。

形成了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拉丁文明等并称的古汉文化圈。然而与印度教、伊斯兰教各国来自宗教的内聚力不同，古汉文化圈来自“汉字”这个极具凝聚力的符号。^①17世纪之前，中华文明的汉文化圈无疑胜过了欧洲文明。直到19世纪中叶，作为整体的汉文化圈表现出的内聚力也明显强于印度教和伊斯兰教的文化区域，甚至不在西方文化区域之下。然而欧洲工业革命诞生的近代文明迅速追赶上东方文明，使得汉文化圈不可避免地走向瓦解。进入东亚的外国势力带来了分裂；东亚区域内部，自然发展的不平衡和政治体制的对立使得一些国家间相互疏远；然而经济发展的协同作用与文化的一致性促进新汉文化圈再次形成的强大因素。经济发展的协同作用，其实就是平衡的商业交换、平等的投资与回报，换句话说，就是互利共赢。文化的一致性则体现在三个层面：在语言的层面，汉字已成为先进文化的传播媒介；在儒家传统的层面，从人际交往方式等非政治的侧面，可以抵消意识形态上的对立，促进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在思想的层面，诗歌艺术带来的普世审美，以及手工艺术的发展，都可以在新技术的领域大有所为。^②

诚如汪德迈先生所言，促使新汉文化圈和谐统一重建的因素，远强于使之分裂瓦解的因素。在古印度文化圈与古汉文化圈相继解体、新汉文化圈和谐重建的过程中，中国的作用举足轻重，印度的作用也不容小觑。

第一，新汉文化圈的重建需要印度。

古印度文化圈一度以佛教征服世界，也曾对古代中国影响深远。古印度文化圈为新汉文化圈的重建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营养。印度佛教，藏传佛教，两大史诗，故事文学，天文历法，六派哲学，不一而足。正是与“二西”（释迦之“西”和耶稣之“西”）相遇，成就了今日之中国。

① [法]汪德迈：《新汉文化圈》，[法]陈彦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2年，第1—2页。

② 同上书，第299—312页。

第二，新汉文化圈的重建有益于印度。

古印度文化圈已一去不返，以佛教征服世界的时代再也不会到来。然而支离破碎的古印度文化圈，事实上很大一部分都留存在了汉文化圈的体内。比如原本诞生在印度的佛教文献，梵文三藏残缺不全，汉文三藏却相当完整。比如如堕烟海的印度历史，多已不存，然而戒日王与唐太宗的六次遣使、《秦王破阵乐》的流传、优填王造像等往事却能在汉文史料中见到详细的端倪，甚至丝绸之路沿线的蔗糖史、医药史这些科技发展的历史，很多也是仅在汉文史料中留存。可以说，很大一部分印度历史，留在了汉文的叙事里。没有汉文史料，这部分印度历史就永远不会为人所知。一些颇具古代印度思想与文化特色的语汇，如“恒河沙数”“万劫不复”“刹那生灭”“一丝不挂”“痴心妄想”“现身说法”等，也悄无声息地进入了我们的成语和现代汉语之中，成为了我们日常交流对话的习语。一如残缺不全的梵文三藏，在汉文三藏中重生；云遮雾绕的印度历史，在汉文史料中重生；艰涩生疏的梵文语汇，在现代汉语中重生。从某种程度上讲，重新崛起的汉文化圈容纳了古代的印度，让已不复存在的古印度文化圈在新汉文化圈中获得了部分重生，也势必会对当今印度的发展带来新的启示。